

一、著書立說，規劃建國宏圖

民國初年到首次護法運動失敗這段時期，在中國近代史上正處在一個新舊交替而又青黃不接的轉折關頭，歷史現象異常錯雜複雜。控制中央政府的反動軍閥走馬燈一樣不停地更換，地方軍閥勢力各自稱雄一方，為所欲為。

這時，南北大小軍閥在各自的帝國主義指使下，互相攻擊，爭奪地盤。自一九一二年以後，幾乎年年有戰爭。全國烽煙遍地，到處響著軍閥混戰的槍聲。連年內戰，使國家經濟遭受嚴重破壞，給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一九一四年，全國陸軍四十五點七萬人，到一九一八年增到八十五萬人，五年間擴軍近一倍。北京軍閥政府為了支付龐大的軍費，任意增加賦稅，橫徵暴斂，敲骨吸髓地壓榨人民。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鹽稅和煙酒稅增加了三倍，印花稅增加了六倍。許多地方預征田賦，如四川某些縣竟預征到二三十年之後。人民的財產生命遭受到極為殘暴的掠奪和蹂躪。一九一七年，南北軍閥在湖南大混戰，皖系的湖南督軍傅良佐發佈戒嚴令，剝奪人民群眾集會、結社、居住、通訊等一切自由，宣佈交戰時可以隨意

破壞「人民的動產、不動產」。皖系軍閥張敬堯在一九一八年進入湖南平江城後，野蠻地屠殺人民，宣佈「三日不封刀」。至於直系、桂系等軍閥對人民所進行的迫害，也同樣殘酷。這次南北軍閥在湖南的大混戰，雙方動員幾十萬兵員，打了一年多，戰區人民經過南北兩軍輪番燒殺，被焚掠一空，造成百里無人煙。其他如四川、廣東等地人民因軍閥戰爭所遭受的禍害，同樣也是慘重的。在封建軍閥統治下，廣大中國人民，受凍受餓，朝不保夕，苦難重重，無法生活下去。

孫中山回到上海後，住在環龍路（今南昌路）六十三號，兩個多月後遷到華僑集資購贈的莫里哀路二十九號（今香山路七號，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住宅。當時，他的處境十分孤立，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之中。孫中山目睹國家情況一天比一天壞，大小軍閥混戰不已，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又看到黃浦江上橫行無阻的是帝國主義的軍艦和輪船，馬路上耀武揚威的是帝國主義的軍隊和員警，矗立著的許多高樓大廈都是帝國主義或軍閥們的商行，外灘公園（今黃浦公園）門口一塊「中國人、狗和自行車不准入內」的帝國主義侮辱中國人民的牌子。他面對著此情此景，憂心如焚，實在有說说不出的痛苦。

孫中山為革命奮鬥幾十年，其結果卻如他自己所說的：「革命主義未行，革命目的未達，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這時，孫中山同北方軍閥決裂了，同南方軍閥也分道了。他一心追求的是救國真理，要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但是，要實現這個理想，應該怎麼辦呢？應該依靠什麼人？聯合什麼？走什麼樣的新道路呢？特別是過去幾十年一再遭受失敗的原因

何在？應該如何去總結失敗的經驗教訓以利前進呢？孫中山感到苦悶，也感到孤獨。他開始了艱難的探索。

上海莫里哀路二十九號，位於法租界的一條寧靜的馬路，路邊植著綠葉茂密的法國梧桐。在這馬路的東頭路南的第三個門就是二十九號。這是一座西式花園別墅，進大門走過庭院是一幢深灰色的兩層樓房。外牆上佈滿了爬山虎、紫藤。樓向陽處，是一片正方形草坪，三面圍繞著四季常青的常青、香樟及玉蘭等樹木和花圃。樓下，一間是會客廳，一間是餐室。樓上，有藏書室、兼辦公用的讀書室、臥室、浴室和招待客人的住室。書室內，四壁圖書琳琅滿目，中外政治、經濟、歷史、地理、法律書籍，應有盡有，就連樓梯角下、過道旁也放有書櫥和書籍。這是一所最適於儉樸生活的孫中山與宋慶齡居住的精緻而不華貴的住宅。有一位菲律賓友人拜訪孫中山夫婦後，描述其中陳設是「半為中式，半為西式，惟出於孫夫人之美術的佈置，頗覺中西折中，幽美可觀。客廳中置一鋼琴，蓋示其家主婦之雅好音樂也」。

在這所房子裡，孫中山靜坐深思，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能夠緊隨時代潮流，適應革命的需要，決心從理論和實踐上再進行新的探索，以總結革命幾經周折的經驗和教訓，尋找引導中國革命勝利、求得民族解放，以及使中國在國際上取得平等地位的道路。

聯合、依靠西南軍閥進行護法鬥爭的失敗，給孫中山上了重要的一課。自辛亥革命以來，孫中山先後進行了「二次革命」、護國戰爭、護法運動等重大鬥爭，結果完全落空，每況愈下。他懷著痛苦的心情，回顧民國以來的七年歷史說：「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

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陷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者，……午夜思維，不勝痛心疾首！」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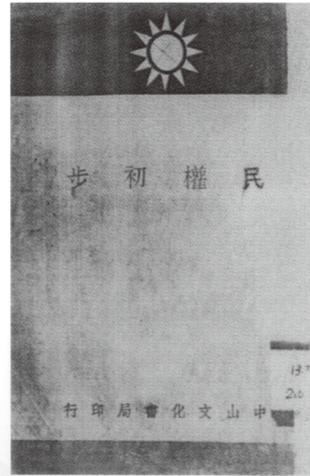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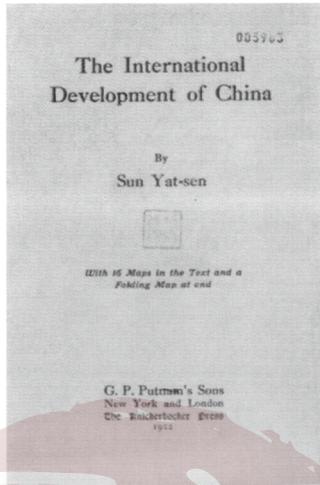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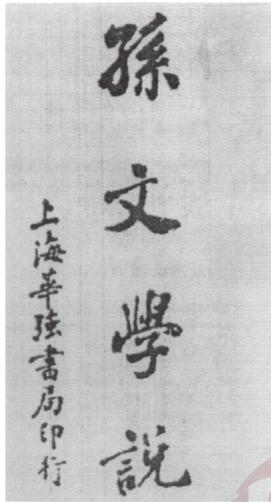
在南北軍閥的黑暗統治下，割據混戰，「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壞，環境使人們活不下去。」⁹⁶孫中山感到未來渺茫，「孑然無助」，承認自己「對於時局問題，實無具體解決辦法」，只能「杜門養晦，聊以著述自娛」，幾乎完全陷於絕望。他只希望專心著書，來「啟發國民」，「喚醒社會」。

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至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這一段時間裡，孫中山深居簡出，苦心研究，發憤閉門著書。他試圖從理論上總結幾十年革命的經驗教訓，並進而寫出個人新設想的建設祖國的宏偉藍圖和遠景規劃，寫成了《孫文學說》和《實業計畫》兩書，連同一九一七年寫成的《民權初步》合為《建國方略》這部重要著作。⁹⁷此外又寫了《〈建設〉雜誌發刊辭》、《八年今日》和《〈戰後太平洋問題〉序》等多篇文章。這時是孫中山從事著述的最集中、最重要的時期。《建國方略》和他的《三民主義》講演，同是孫中山在思想方面的貢獻，也是研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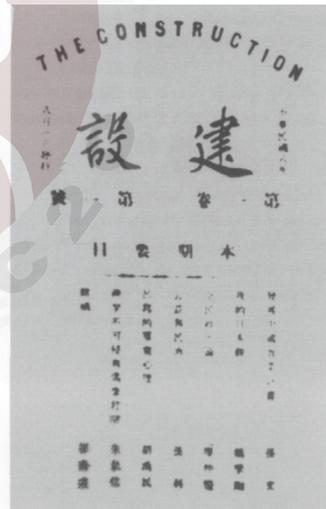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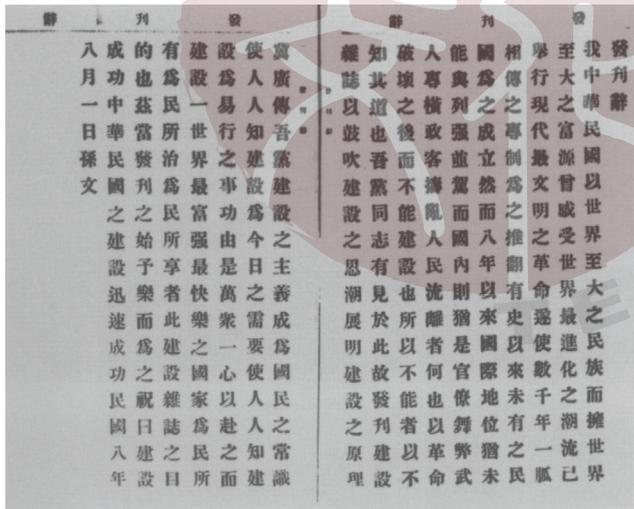
95 《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百〇四—一百〇五頁。

96 《孫中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一千三百五十九頁。

97 《民權初步》、《孫文學說》、《實業計畫》鼎足而立，構成《建國方略》。《民權初步》是譯自《西國議學之書》的《會議通則》，孫中山以此教人民集會的方法。



孫中山所著《建國方略》的三個組成部分：《孫文學說》、《實業計畫》（英文版）和《民權初步》。



一九一九年八月，根據孫中山的指示意見，廖仲愷、朱執信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以宣傳革命黨的建設思想。圖為《建設》雜誌封面和孫中山撰寫的發刊詞。

的思想的最主要文獻。

孫中山畢生奮鬥的最高目標就是振興中華。他是因愛國而革命，革命則是為著建設新的國家。他所宣導的革命建設，有社會、物質和心理三方面的建設，總的體現在他撰寫的《建國方略》這部巨著裡。這部書是孫中山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是他關於政治、經濟、哲學思想方面的力作，也是他提出的一部關於中國近代化事業的重要巨著。

《民權初步》，最早名稱叫《會議通則》（即《建國方略》之三「社會建設」）。

這是一本介紹民主政治的初階的啟蒙讀物，全書分五卷二十章二百五十八節，內容很豐富。首冠「自序」，書後附「結論」及「章程並規則之模範」。

孫中山在「自序」中指出，撰書目的在於「教吾國人行民權第一步之方法」。認為中國人民的「一盤散沙」狀態並非「天生使然」，乃是「專制有以致之也」，即「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世」所造成的。至於袁世凱的復辟，根本原因在於「民權



一九三〇年，有關部門根據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提出的經濟建設目標繪製成的《孫總理實業計畫圖》，從交通、商港、鐵路、礦業、農業、森林等諸方面展示了孫中山關於經濟建設的遠大理想。

未張」。顯然，這是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抨擊。

孫中山指出：「今後民國之安危如何，則全視民權之發達如何耳。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始；而欲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又非從集會不為功。是集會者，實民權發達之第一步。」；「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穩，則逐步前進，民權之發達，必有登峰造極之一日。苟人人熟悉此書，則人心自結，民力自固。」⁹⁸

在該書中詳盡地論述了有關集會的「原則」、「條理」、「習慣」和「經驗」，以及集會、結社、議事、動議、討論、選擇、表決等秩序和操作細則，這些雖只是涉及民主社會建設的純粹技術性環節，卻實是程式民主中實體民主的前提和條件。孫中山希望借此促進「民權之發達」，建設國家。他所闡述的這些，雖非民主政治的關鍵，但對長期「受集會之厲禁」的中國人民來說，也具有一定的啟蒙作用。特別是他根據中國的情況，而把國民民主政治意識的養成與社會進步、國家富強問題緊密聯繫起來的思路，是很可貴的。

過去長期以來，對《民權初步》一書缺乏恰如其分的評價。其實，它並非毫無實際意義的繁瑣哲學，在當時軍閥官僚們把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因素剝奪殆盡的情勢下，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是改造國民性的初步嘗試。它集中體現了民權主義中「主權在民」的基本原則和民主自治的基本精神。它是針對國民長期處於封建專制主義之下，從無民主參政議事、

民主集會結社意識可言的落後狀況，為廣大民眾即將進入民主參政議事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規範的精心建構。這只是孫中山的民主政治思想的雛形。

孫中山希望通過踐行《民權初步》，養成民主參政集會結社的自治意識和文明習慣，促進人的現代化。它雖具有積極意義，也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但限於當時的時局要徹底貫徹實行是不可能的，若以此作為改造社會現狀的手法，更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空想。實際上真正妨害民主政治的並非是人們缺乏「議學」知識，而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

《孫文學說》，又名《知難行易的學說》（即《建國方略》之一的「心理建設」）是孫中山著述中最近於純哲學著作。它比較集中地論述了認識論（知、行關係）的問題。孫中山以「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為命題，歸結為「知難行易」，「有志竟成」。全書以大量篇幅著力於打破中國幾千年來「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傳統觀念，樹立「行之非艱，知之維艱」的新觀念。書中以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十事為例，證明了人們的實踐具有廣泛的可能性，「行艱」是錯誤的。《孫文學說》中所舉的例證並不完全正確，但他試圖從理論上探索以往失敗的原因，批判了「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保守、退縮等消極思想。為什麼「當滿清之世，余之主張革命也，猶能日起有功，進行不已；惟自民國成立之日，則余之主張建設，反致半籌莫展，一敗塗地」？「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孫中山的結論是：「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則

建設事業，亦不過反掌折枝耳。」⁹⁹孫中山認為，行在先而知在後，知是從行中得來的，所以行易知難。人生下來就會吃，無須教就能行；但關於飲食烹調的學問，則必須經過長期實踐才能獲得。這種行先知後、知由行中獲得的觀點，顯然是唯物主義的。他還認為「不知亦能行」，要敢於實踐，敢於革命和建設，把知行學說作為鼓舞人們努力奮鬥的思想武器，是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的。

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畢竟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不同。他過分強調知難，抬高知而貶低行，割裂了知行本身的辯證關係，不能不終於倒向唯心主義。他反復強調改造心理的重要，誇大人的心理作用，把革命成敗歸結於「心之為用」，「心」是「萬事之本源」。他說：「滿清之顛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此心敗之也。」這就不可能正確總結過去勝利和失敗的原因和經驗教訓。因而，既不能認清中外反動派的本質，也看不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巨大的物質力量。他把人分成「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三等，強調先覺者的作用是必要的，但輕視廣大人民的實踐，把群眾視為「阿斗」是十分錯誤的。「先知先覺者」脫離廣大人民群眾，不能不是孫中山無數次失敗的根源。

在《孫文學說》中，他說：「先知先覺者，為創造發明」；「後知後覺者，為仿效推行」；「不知不覺者，為竭力樂成」。這是孫中山一貫思想的概括，關於「知」的思想貫徹於他的全

部學說和主張。他以先知先覺者對「知」的自信，而要施行「訓政」，要求對他個人的服從；服從他和他的主義，就是服從他主張的革命。但是，他作為「先知先覺者」，卻有很強的責任感，這使他雖屢遭挫折而不喪失進取精神。

《孫文學說》全書——特別是第八章「有志竟成」中，對過去的革命經驗教訓——尤其是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按照他當時的認識和理解做了比較系統的總結，從而為以後的思想發展提供了積極因素。

《孫文學說》連同孫中山後來的《軍人精神教育》（闡述對於哲學基本問題——物質與精神的想法）和《民權主義》（提到世界起源論和人類起源論的問題）等著作和講演，集中反映了孫中山的哲學思想。在這些著述中，孫中山熱情地宣傳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並以大量的自然科學知識為依據，較為詳細地闡述了他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物質派生精神，行先知後，是孫中山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基石，科學進化論則是他的哲學思想的理論基礎。孫中山的哲學思想是豐富的，他的唯物主義哲學體系基本上是完整的。然而，他的社會歷史觀，即「民生史觀」，則是二元論和唯心論的。

孫中山的哲學思想，是與他的革命鬥爭密切聯繫著的，是為他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提供理論根據的。孫中山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們要批判繼承的一份優秀遺產。

《實業計畫》（即《建國方略》）之二的「物質建設」，集中地代表了孫中山的經濟建設

思想，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它最為系統地闡述了孫中山關於中國在經濟上走向現代化的總體構想。孫中山懷著徹底改變中國落後面貌，躋身於世界近代強國之林的鬥志豪情，通過摸索、調查並參照外國經驗，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制定了使國家富強的宏偉藍圖。孫中山終極目的，是要建設以大工業為中心的全面現代化的新中國。

《實業計畫》用英文寫成，原名《The Internatn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書中闡述了開發中國實業的途徑、原則和計畫。孫中山深感中國要富強起來，必須改變當時落後的經濟狀況，因此就要花很大的力氣開發中國的富源，發展中國的實業，進行「工業革命」。他把這個問題視為「此後中國存亡之關鍵」。書中提出了十項龐大建設計畫：一、交通之開發；二、商港之開闢；三、建設全國鐵路系統和新式街市；四、水利之發展；五、設立冶鐵、制鋼、造士敏土三大工廠；六、礦業之發展；七、農業之發展；八、蒙古、新疆之灌溉；九、於中國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十、移民於東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他在所設計的建設新國家的大計畫中，把鐵路和公路的建設、水路的修治、商港和市政建設放在首位，作為優先發展的部份。計畫修建十萬英里（即十六萬公里）的鐵路，提出以七大鐵路系統，共計一百〇六條路線的規劃，把中國的沿海、內地和邊疆連接起來；修建遍佈全國的公路網，建成一百萬英里的公路；在中國北、中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個「如紐約港」那樣世界水準的大海港；北方大港、東方大港及南方大港以及許多新的商埠；開鑿、整修全國的水道和運河，治理內河交通和興修水力、電力事業，大力發展農、林、牧業；建立和發展包括鋼鐵、煤炭、石油、電力、機械製

造、有色金屬、水泥等在內的大工廠、大企業，並把墾荒、採礦、冶鐵、煉鋼等放在突出的地位，全面開採煤、鐵、石油、有色金屬和非金屬礦產；大力宣導用機器和科學方法改良耕地，實現農業生產的現代化，並且大規模移民開墾邊疆，提出了化兵為工的意見，主張將裁撤的兵士，「以為築港建路及開發長城的沿線地方之先驅者」；還要建立和發展紡織，食品加工等多種輕工業等等。

孫中山認為：「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佔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其意圖是要建立以國家資本為主，私人資本為輔的經濟體制模式。而其發展的原則是：「（一）必選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資；（二）必應國民之所最需要；（三）必期抵抗之



孫中山在《實業計畫》中規劃的北方大港面貌圖。

至少；（四）必擇地位之適宜。」¹⁰⁰

要實現如此宏大的計畫，所需要的資金、人才、方法從哪裡來？早在民國初建，他在北京記者招待會上的演講就說：

「我無資本，利用外資」；「我無人才，利用外國人才」；「我

無良好方法，利用外人方法」。在《實業計畫》中他進一步提出吸收外資：「凡諸工業國，其資本有餘者，中國能盡數吸收之。」此外，他還提出了化兵為工的意見，主張將裁撤的兵士，「以為築港建路及開發長城以外沿線地方之先驅者」。

稍後，一九二〇年，孫中山在另一篇關於實業計畫的文章中說：

「吾國既具有天然之富源，無量之工人，極大之市場，倘能借此時會，而引用歐美戰後之機器與人才，則數年之後，吾國實業之發達，必能並駕歐美矣。」

「惟所防者，則私人之壟斷，漸變成資本之專制，致生社會之階級，貧富之不均耳。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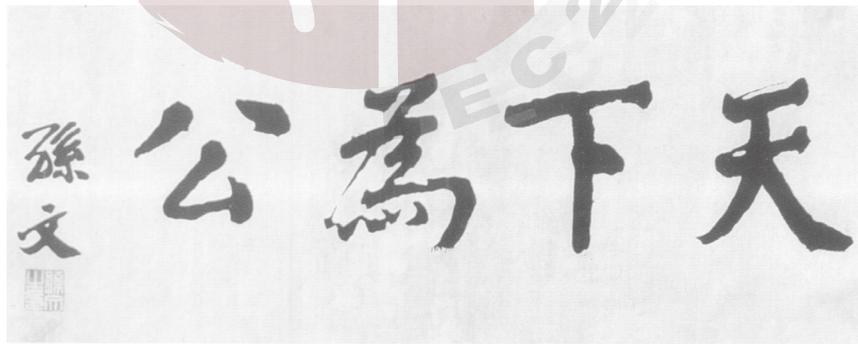


孫中山勾畫過的京漢鐵路圖。

之道為何？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鐵、水利、石油等，及社會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點等，與夫一切壟斷性質之事業，悉當歸國家經營，以所獲利益，歸之國家公用。如是，則凡現今之種種苛捐雜稅，概當免除，而實業陸續發達，收益日多，則教育、養老、救災、治病及夫改良社會，勵進文明，皆由實業發展之利益舉辦，以國家實業所獲之利，歸之國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歐美今日之覆轍，甫經實業發達，即孕育社會革命也。此即吾黨所主張民生主義之實業政策也。凡欲真正國利民福之目的者，非行此不可也。」

孫中山詳細探討了利用外資、外才和外國技術過程中帶有技術性的問題，特別強調主權必須操在中國人手裡，不旁落於帝國主義者手中。他說：「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¹⁰¹

《實業計畫》是一個以國家工業化為中心的，使中國人民經濟全面現代化的大規模建設規劃。它氣魄宏偉，包含著



孫中山手跡。

孫中山關於經濟建設的一系列理論觀點、方針政策和步驟方法，其目的是要把貧窮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改造為資本主義強國。

孫中山對於中國經濟向現代化發展的思考，早在一八九四年他在《上李鴻章書》中就已開始，到民國建立以後便進行了更為具體而實際的籌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著手制定《實業計畫》時，對這一問題至少已認真研究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該書實際上是孫中山經過大量理論與實際調查材料的精心準備，對世界各國特別是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反復思考和積極探索，將自己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外開放、利用外資、振興實業、發展國民經濟的認真總結的結晶。它最為系統地闡述了孫中山關於中國在經濟上走向現代化的總體構想。再聯繫到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後所宣導的改革開放、自主創新、鼓勵留學生創業等言論和思想，可歸納為五個方面，即（1）對外開放；（2）利用外資；（3）獨立規劃；（4）主權在我；（5）創造精神。

孫中山的這些主張，顯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希望加速實現經濟現代化，促使中國富強起來的反映。它是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是有進步作用的。當然，孫中山所追求的經濟現代化是屬於資本主義現代化範疇，但是，它卻是結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現代化，而不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生搬硬套。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由於實行了開放政策，積極吸引外資，使這部著作早就提出的類似主張被發掘出來，並獲得肯定的評價。

孫中山的《實業計畫》，只是「實業計畫之大方針，國家經濟之大政策而已」，其上述的這些構思、議論和設想，儘管其中還有脫離實際之處，有頗大比重的理想化或空想的部分，但是，更值得人們驚異的是他對經濟發展中許多重大的關係關鍵問題的洞見。因此，就既非夢想，亦非全是空想，只不過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不允許把它付諸實踐罷了。實踐有力地證明，孫中山發展國民經濟的思想，是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的，是有進步作用的，它不僅給後人留下了一份富有價值的啟示和激勵，而且在今天對於我們仍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作用。

孫中山主觀上把實現他的現代化看為「社會主義」，造福全國人民，實際只能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資本主義的國有化，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但是，他在經歷了無數挫敗之後，仍然為祖國富強、改善人民生活、改變中國的落後狀況而嘔心瀝血，精心設計，頑強奮鬥，這是偉大愛國者的十分可貴的思想。

總的來說，孫中山在上述的這些著述裡，試圖從理論上總結幾十年革命的經驗教訓，並進而寫出自己所設想的建設祖國的宏偉藍圖、遠景規劃，提出了一整套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理論、方針和策略。這表現出孫中山不斷追求真理的革命實踐精神和對中國民主化、工業化的強烈願望。其中他還滿懷信心地說明了中國必然會隨著時代潮流而進步，一躍而走上富強之路。孫中山說：「以此至大至優之民族，據此至廣至富之土地」，「中國人經受數世紀之壓迫，現已醒覺，將起而隨世界之進步，現已在行程中矣」。並且豪邁地斷言：中國「千百年前已嘗

為世界之雄矣！……是中國今日欲富強則富強矣，幾有不待一躍之功也。」當然，孫中山這個期間的著述，儘管主觀上是力圖變革現狀，探索出中國的新的途徑，但由於種種局限，在他的書中也有不夠正確或消極的東西。例如：在《孫文學說》中，他對心理改造的重要，再三反復地申述，誇大個人的心理作用，而看不到人民群眾的偉大的物質力量。他把人分為三等：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強調少數先知先覺者的作用，而輕視廣大勞動人民的實踐；並從而引申到認為四萬萬中國人民是無能的「阿斗」，而少數的「先知先覺」者是「諸葛亮」。在《實業計畫》中，他有依賴帝國主義援助來實現中國近代化的幻想，等等。

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經過三十多年的實踐，終於陷入絕境的事實，恰好證明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裡，從西方學來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武器，已經不可能引導任何真正的革命走向勝利。舊民主主義的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建立資產階級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所用的各種印章文字。

共和國，只是一種幻想。

孫中山沉痛地回顧著辛亥革命以來一再遭受的挫折和失敗，摸索著繼續前進的方向和道路。

二、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

為了更好地適應潮流，爭取革命勝利，孫中山隱約地覺察到過去的革命方式不能適應當前的革命形勢，所以他在五四運動發生的同年十月，將中華革命黨正式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加上「中國」二字，以表示有別於一九一二年的國民黨），使該黨由秘密而公開，以適應五四運動後的國內急劇變化的形勢，接納當時的愛國青年入黨。

早在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一九一八年六月孫中山抵達上海時，為了把國民黨的主力從海外轉移到國內，他便開始籌畫擴張黨務，重訂黨章，以促黨務的發展。八月三十日，他在《通告海外革命黨人書》中說：「歸滬而後，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黨之擴張，故亟重訂黨章，以促黨務之發達。」至此，中華革命黨在國內的影響已經微弱到了極點，孫中山不得不向原國民黨的各派勢力妥協，以求團結更多的力量。於是，宣佈恢復國民黨的名義。事實上，中華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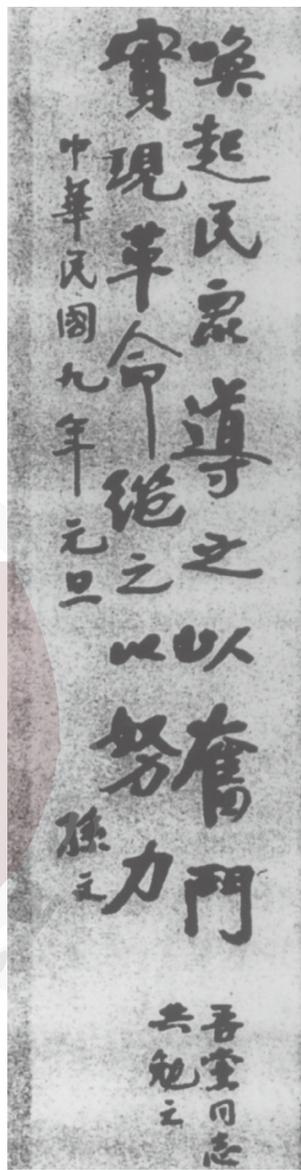
中國國民黨本部之印。

命黨恢復國民黨名義後，國民黨作為一個政黨的活動很少。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中華革命黨正式定名為中國國民黨，並公佈新黨章《中國國民黨規約》。在這之前，國民黨的名稱在國內並不統一，除有中華革命黨、國民黨、中國國民黨等名稱外，還有的地方稱中華國民黨，而且黨章不一。所以，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頒佈該黨規約時，才明確「從前所有中華革命黨總章及各支部通則，一律廢止。所有印章、圖記，一律照本規約所定，改用中國國民黨名義，以昭統一，而便進行」。¹⁰²民國元年國民黨是由中國同盟會等五個黨



中國國民黨黨證。



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孫中山給全體國民黨黨員題寫的勉詞。

合併而成的；中國國民黨則由中華革命黨演變而來。因此，除原中華革命黨的黨員外，新入黨的黨員，仍須依據《中國國民黨規約》履行手續。

當時，中國國民黨「設本部於上海，總理全黨事務」，本部設總務、黨務、財政三部。孫中山委任居正為總務主任，謝持為黨務主任，廖仲愷為財務主任。

《中國國民黨規約》共八章三十二條，在第一章《總綱》中明確規定：「本黨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政綱」。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總稱，它是孫中山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社會變革三個歷史任務，並著力於解決這三項任務而提出來的民主革命的政治思想綱領。但是，除《中國同盟會總章》提出的：「本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已經含有三民主義內容外，其他時期的黨章，比如在國民黨和中華革命黨的章程中，

均未明確提出實行三民主義這個宗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在國民黨內普遍存在這樣一種觀點，認為清朝統治已經被推翻，民族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而今後只解決民權、民生兩個主義就行了，在政治綱領中不必再提民族主義了。基於這樣一種錯誤認識，在《國民黨規約》、《中華革命黨總章》中，均不提民族主義。

辛亥革命後，還要不要再提解決民族主義的任務，孫中山本人也曾一度認為民族主義「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實現」，革命黨的主要任務只剩下民權、民生主義，所以擔任了「全國鐵路督辦」。後來，他認識到沒有民主，沒有真正的共和，國家不可能富強起來，於是又提出為民爭權的任務。所以，一九一四年，他親手制定的《中華革命黨總章》，只提「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沒有提民族主義。然而，孫中山的思想是隨著時代潮流的發展而前進的，為了民族利益，國家的前途，總是在追求真理，修正錯誤。這一點，在他的革命鬥爭實踐中是顯而易見的。而且越是他晚年，這個特點越突出。他在所代表的那個階級利益許可的範圍內，做了很大的努力，力求衝破資產階級的局限，找到救國救民的道路。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面臨十分困難、十分複雜的局面。由於袁世凱竊奪政權後，中華民國名存實亡，使民族問題呈現出異常慘澹的景象：帝國主義列強依然騎在中國人民頭上，殘酷地榨取廣大群眾的血汗；封建軍閥政府則實施大漢族主義的反動民族壓迫政策，少數民族仍舊受著歧視和排斥。為了鞏固共和政體，孫中山在苦悶彷徨中，同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軍閥獨裁集團，進行了長期的艱苦的鬥爭。在長期失敗的教訓中，他更加認識到思想必須適應新的形勢。這個

變化表現在他對國內外重大事件的態度上，而國內外的重大事件也給他思想上的轉變以很大的促進。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中國五四運動的爆發，使孫中山在「孑然無助」的困境中，看到了光明的未來。他讚揚十月革命的勝利，欽佩列寧領導的成功，早在一九一八年初，他在致列寧的賀電中說：「十分欽佩，並願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共同鬥爭。」他支持五四運動，認為以青年學生為發動的這場運動定會為「最有價值之事」。這時，孫中山寓居上海從事《建國方略》的著述，總結過去的經驗和教訓，儘管在長時間裡他沒有完全認清帝國主義的反動本質和真面目，進而旗幟鮮明地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響亮口號，並使民族主義發展為指導民族解放運動的政治綱領，但他畢竟對民族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作出初步的檢驗，明確提出反帝主張，並將這方面的成果體現在《中國國民黨規約》中。他說：「當初同盟會還只明白民族主義，拼命去做；……其實民族主義也沒有做完。」所以如此，是因為認識上出現偏差：「有人說：『清室推翻以後，民族主義可以不要。』這話實在錯了。即如我們所住的租界，外國人就要把治外法權來壓制中國人，這還是前清造成的惡因。現在清室雖不能壓制我們，但各國還是要壓制的，所以我們還要積極的抵制。」這裡，孫中山在否定先前一度持有的民族主義「因清廷退位而實現」的片面認識的同時，表明他日益認清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大敵，開始產生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並寫入黨章。毋庸置疑，這個觀念變化雖然是膚淺的，但是非常可貴的。

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以後，孫中山多次強調提高對黨的認識，明確黨的任務，發展壯大黨的力量，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和提高黨的素質的重大意義。他突出強調黨的巨大作用

首先在於創建民主國家，沒有中國同盟會就沒有中華民國。他說：「中華民國何以成？以有同盟會。故從前同盟會開始不過數十人，一兩年後就發展到若干萬人，所以到了辛亥年，一舉就成功了一個中華民國。但是那年武昌起義後，十二月間我到上海，有一種很可怪的空氣，此空氣為何？即是一班官僚某某等及革命黨某某等人所倡言的『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是也。當時這樣言論的空氣充塞四周，一倡百和，牢不可破。我實在是莫名其妙，無論如何大聲疾呼，總喚不醒。所以後來革命黨的失敗，都是在這句話上面，這是我們大家不可不徹底覺悟的。」¹⁰³孫中山號召全黨認真總結辛亥革命後失敗的教訓，以提高對黨的作用的認識，增加黨的觀念，徹底肅清「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消極影響。

孫中山明確提出中國國民黨還要繼續革命，打倒舊官僚軍閥，為建立一個真正共和國而奮鬥。並且重申革命的目標在於：「服膺於革命主義，黽勉力行，以達革命的目的，而建設一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之國家。」¹⁰⁴他說：「現在的中華民國只有一塊假招牌，以後應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夠做成一個真中華民國。」所以「我們的責任，以後就在造成一個真中華民國」。「真中華民國由何發生？就是要以革命黨為根本。根本永遠存在，才能希望無窮的發展……我們中華民國算是一棵大樹，我們革命黨就是這樹的根本，所以我們要格外留意，將根本好好培植。」；「黨事為革命源起事業，革命未成功時要以黨為生命，成功後

103 《孫中山全集》第五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第二百六十二頁。

104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篇，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版，第二百八十七頁。

仍絕對用黨來維持。所以辦黨比無論何事都要重要。我常勸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¹⁰⁵孫中山強調的「大事」，就是實現三民主義，創建一個真正的共和國。

為了完成黨所肩負的重任，孫中山接著指出，必須加強思想建設。他說：「黨所重的是有一定的主義；為要行一定的主義，就不能不重在人。」；「我們要造法治國家，只靠我們同黨人的心理。黨之能夠團結發達，必要有兩個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二是主義作用。」；「諸君切勿以為黨事無足輕重，諸君如將黨辦得堅固，中華民國亦就堅固了。」；「現在辦事要義：第一，須知黨事為重，遇事就要辦理，萬不可稍有延滯，因為光陰比什麼都貴。一件事早一刻辦，就早一刻收效果。第二，形式與精神並重，形式完備後，才能振起精神……第三，我們以後要注意培養人才與延攬人才，將來種種事業，非有多數的人才莫可。」¹⁰⁶

那麼，怎樣才能把國民黨建設好呢？孫中山強調指出，必須實行以三民主義為宗旨。他說：「我們造一個黨，是因為要把我們的主義和目的貫徹到底。」；「所以我黨就要以三民主義為宗旨、五權憲法為目的，合攏這兩條來做革命。」；「三民主義缺一不可。這是確定不能改易的。」¹⁰⁷

孫中山關於政黨的意義和任務以及健全黨務方面的言論，充分體現了民主主義政治觀念，

105 《孫中山全集》第五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第二百六十二—二百六十三頁。

106 《孫中山全集》第五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第二百六十二—二百六十三頁。

107 《孫中山全集》第五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第二百九十、二百九十三、二百九十四頁。

作為反對封建專制的產物，在當時的社會政治思想領域當然有著不容忽視的進步意義和積極作用。

總之，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後，孫中山對許多問題開始有新的認識，思想比以前有所進步。特別是他從多次失敗的教訓中，深刻地意識到過去自己所憑藉的軍閥力量是根本靠不住的，並且看到「大多數人又起而革此少數人之命」，已是當時「不可抑遏」的世界潮流。因而他相信，將來「必致政權歸於平民而後已」。於是，他認為要拯救中國，一方面要組織力量堅持「護法」鬥爭，「恢復合法國會」，實現真正共和政體；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重新開始革命事業，以求根本改革」。根本改革怎樣去做呢？他說：「南北新舊國會，一概不要它，同時把那些腐敗官僚、跋扈武人、作惡政客，完完全全掃乾淨它」，「從新創造一個國民所有的新國家」。在這段時間的演講中，他還放棄了一些曾經主張過的，比如「教育救國」、「實業救國」、「地方自治」等不完全符合實際的思想，明確提出：今後「改造中國的第一步只有革命」，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建造出「比現在的共和國還好得多」的共和國。這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傑出代表在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五四運動後作出的難能可貴的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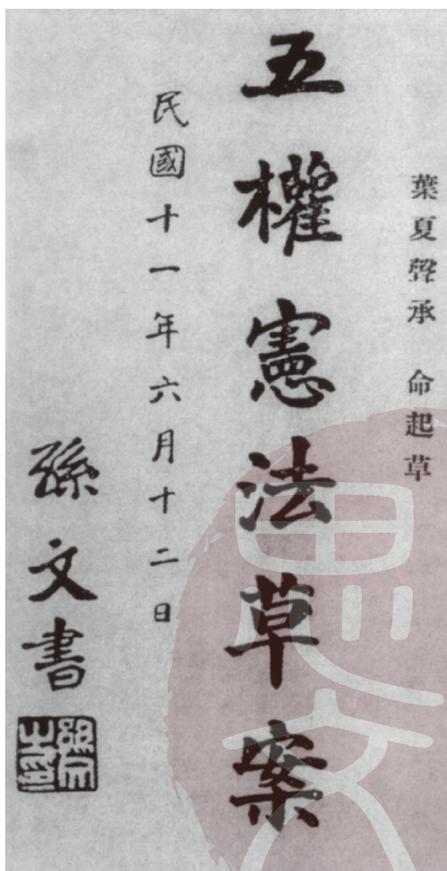
三、二次護法運動

五四運動後高漲的革命形勢，不僅在思想上促進了孫中山新的覺醒，而且在行動上堅定了他再度南征，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信念。

當一九一八年六月孫中山離粵回到上海時，護法軍政府在桂系軍閥把持下，雖已無護法之實，但廣東這塊地方卻被他們盤踞著。孫中山一心要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為了繼續護法反對北洋軍閥的罪惡統治，便決定首先摧垮桂系軍閥，奪取和鞏固廣東這塊民主革命的根據地，進而完成民主革命事業。

這一次，孫中山把打倒桂系的希望寄託在他親手培植起來的「援閩」粵軍身上，對「此軍實行護法，再造共和，實所厚望」。這支有兩萬多人的軍隊的總司令陳炯明，也是他任命的。孫中山期望這支軍隊能打開一個局面，為他撐腰爭氣。

在「首次護法運動」一節中，曾提及「援閩」粵軍，是孫中山一九一七年底，以極大努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孫中山在廣東省教育會作「五權憲法」的專題演說，次年委托葉夏聲起草《五權憲法草案》，主張立法、司法、行政、彈劾、考試「五權分立」。

力從粵督陳炳焜等手中爭到省長公署的二十營警衛軍為基礎建立起來的。那時他在廣州受桂系軍閥威逼，深感必須有自己的軍隊，便任命陳炯明為總司令，並抽調一些黨員和軍事幹部分任各級領導。開始約八千人，以護法援閩名義開入閩南，向福建方向求生存和發展，後來發展到兩萬餘人。

長期以來，出於諸多原因，陳炯明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是一位充滿爭議的人物。歷史資料說明，陳炯明是個頗具民主思想的人，其所作所為有異於一般軍閥。他在辛亥革命後主政廣東時期，曾推行嚴禁煙賭、改革教育及發展經濟等措施，提倡新文化運動，支援中共領導的工會組織和所辦的機關報《廣東群報》，推行地方自治，致力於要把廣東建設成為全國的模範省。但另一方面，他主張保境安民，推行地方自治，反對廣東介入軍閥內戰；還宣導聯省自治，反對中央集權和武力統一。這些就與孫中山的建立護法政府和聯合奉皖軍閥北伐直系軍閥的策略存有分歧，二者完全背道而馳，致最終釀成政爭升級而兵戎相見。

而當時，孫中山是把這支部隊視為最可靠的革命武力，對陳炯明也認為是「可資依靠」的「革命將領」。他傾全力裝備這支部隊，並將國民黨的軍事人才如鄧鏗、許崇智等配備在這裡，甚至批准全體官兵均宣誓加入國民黨，期望他們成為革命軍。他要倚靠它達到革命的目的。

一九二〇年六七月間，孫中山特派朱執信、廖仲愷等前赴漳州敦促陳炯明回粵討伐桂系，但陳遲疑不決。後在桂系準備向閩進犯，使援閩軍受到直接威脅時，陳炯明才於八月十二日誓師回粵，分兵三路出發進攻桂軍。在孫中山的大力支援和廣東民軍紛紛響應下，僅經過兩

個多月的戰鬥，就打败盤踞廣東的桂系軍閥，驅逐了岑春煊、陸榮廷等，全面攻克廣東。

十一月二十五日，孫中山應粵軍許崇智的請求，偕伍廷芳、唐紹儀等離開上海重返廣州。二十九日，他在廣東軍民歡迎聲中，重新組成軍政府，宣佈繼續執行護法職務。過去因受壓迫而離粵的部分國會議員，經過國會遷滇、遷渝等顛沛流離後，紛紛回應孫中山的倡議，也於此時相繼返粵，準備重新召開國會非常會議。

這時，孫中山並不滿足偏安一隅。他已認識到光舉起護法旗幟，「斷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說明他在艱苦奮鬥中其思想又向前邁進了一步——主張建立正式政府。因為「護法不過矯正北政府之非法行為，即達目的，於中華民國亦無何裨益。況護法乃國內一部分問題，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對外亦不發生國際上地位之效力」。¹⁰⁸所以，要達到「完全成功，要平定西南，鞏固民國基礎，必須建立正式政府」。因此，孫中山建議國會議員迅速組織正式政府，以取代北洋軍閥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並號召廣東軍民給予贊助。

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在軍政府演講時說：「此次軍政府回粵，其責任固在繼續護法，但余觀察現在大勢，護法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吾人從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針，開一新紀元，鞏固中華民國基礎，削平變亂。方針維何？即建立正式政府是也。」所以他主張：應「仿南京政

府辦法在廣東設立一正式政府，以為對內外之總機關」。一月十二日，國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在會上建議，取消總裁合議制的軍政府，選舉總統，建立正式政府。

與此同時，國內外要求成立正式政府及選舉總統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英屬、美屬、荷屬各埠華僑紛紛以國民黨名義拍發電報，請求選舉總統；國內各社團則召開國民大會，擁護組織正式政府。

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國會非常會議參眾兩院聯合會在廣州舉行，出席會議的議員共二百二十人，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並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接著，撤銷了軍政府，孫中山於五月五日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職，準備要用一個權威的政府將革命進行到底。這是孫中山第二次在廣東建立政權。

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當天，發表《對外宣言》，指出：「北京政府已不為國人所公認，



廣州各界二十萬人集會遊行歡慶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情景。

彼之倖存，不過據有曆古建立之國都，因而得外國之承認，一九一三年，國會組織之民國政府，曾經友邦之承認，本政府亦為此國會所組織者，應請各友邦政府援此先例，承認為中華民國惟一之政府。」並明確廣州政府對外方針是「抱開放門戶主義，歡迎外國之資本及技術」。並及時致電北京政府的傀儡總統徐世昌，促其「即日引退，以謝國人」。

孫中山就職後，任陳炯明為內務總長兼陸軍總長，伍廷芳為外交總長，唐紹儀為財政總長，湯廷光為海軍總長，李烈鈞為參謀總長，馬君武為總統府秘書長，廖仲愷為財政次長，伍朝樞為外交次長，徐謙為司法部長。他在《就大總統職宣言》中指出：「際此撥亂返治之始，事業萬端」，希望全國人民「各盡所能，協力合作」，共同來促進國家的繁榮富強。他闡述了今後的建設方針，表示要「竭志盡誠以救民國，破除障礙，促成統一，鞏固共和基礎」。

109

109 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時與軍政人員合影。

當時，孫中山感覺前景光明起來，便著手整頓內政。他制定頒佈了一系列改革吏治、保障人民權利、發展經濟的法令和措施。

例如：他鑒於廣東「財力疲困」，主張裁員減政，號召大家「少做官，多做事」；¹¹⁰並制訂了文武官吏任職宣誓條例，要求官員正直

供職，不得受賄，希圖藉以形成

廉儉風尚。又命令廢止袁世凱時期遺留下來的鎮壓人民的有關刑法及《治安警察條例》，頒佈了工會法，承認勞動者有集會結社權、同盟罷工權、團體的契約締結權等；¹¹¹並支持工會，對廣東的工人運動採取優先贊助的態度，明確指出民生主義應恢復工人人格和增進工界幸福。¹¹²還聲援被北京政府迫害的北京八校教職員和學生，支持知識分子對北洋軍閥的鬥爭，¹¹³並飭令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孫中山與宋慶齡在廣州「出征軍人慰勞會」開會前留影。

110 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111 李大釗等《為革命的德莫克拉斯提案》，《少年中國》第三卷第十一號，第七十八頁。

112 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113 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

外交部向英國交涉，保護南洋華僑教育等等。

不過，孫中山當時的主要目標，是要進行北伐，即用武力打倒軍閥，「削平變亂」，統一全國，以便實現民主共和。為了這一目的，就須首先消滅在廣西的桂系殘餘勢力，以免它為患廣東，成為北伐的後顧之憂。因此，他於六月二十七日，命令粵、贛、滇、黔各軍出兵討伐陸榮廷等，並任命陳炯明為「援桂」總司令，分兵三路攻襲桂軍。

當時，宋慶齡和何香凝都參加了這次討桂戰爭。她們在廣州發動婦女組織「出征軍人慰勞會」（會址設在總統府內），宋為會長，何香凝擔任總幹事。廣東、廣州各界婦女團體報名參加的十分踴躍。她們率領會員們四處奔走，向社會各界籌集經費和慰勞員；並帶領慰勞隊到一些傷兵醫院慰問傷兵，還親赴廣西梧州前線進行慰問討桂部隊，給了官兵很大鼓舞，增強了戰鬥力，並在早期的中國婦女運動中，為婦女參加社會工作，支持革命戰鬥部隊樹立了榜樣。

由於孫中山親自督師，將士用命，百姓支持，討桂戰爭捷報頻傳。八月四日，粵軍攻佔了廣西首府南寧。十三日，攻克了桂林。九月三十日，奪下了桂系軍閥的最後據點龍州。陸榮廷、譚浩明逃往越南河內。桂軍多半投降，廣西回歸護法政府的管轄範圍。在短短三個月來時間，出征軍隊統一了兩廣。

統一兩廣後，孫中山決定出師北伐，實現統一全國的計畫。一九二一年十月八日他提請非常國會通過了北伐案，十五日即乘軍艦巡視廣西，準備北伐。北伐軍共三萬餘人也同日出

發。十二月四日到達桂林，孫中山立即著手組建北伐大本營，派廖仲愷負責籌畫財務，鄧鏗負責組織警衛部隊，派陳炯明回廣州籌辦後勤供應，計畫先取湖南，再大舉北上。

孫中山把北伐大本營設在桂林獨秀峰山麓的王城。這裡是元、明兩朝藩王的故宮，也是清代鄉試的貢院和民國初年的省議會（今廣西師範大學院內）。這裡有一座鋼材建築的大禮堂，是桂林當時唯一的一座禮堂，市民稱它「鐵房子」。孫中山利用空餘時間，還在這座禮堂裡連續對各界群眾作了三民主義的講演和關於「知難行易」哲學的闡述，受到桂林人民的熱烈讚譽。

一九二二年一月間，孫中山把北伐軍組成七個軍團，共四萬餘人，並基本編制完成，待命出發。二月三日，他以大元帥名義頒發動員令，命令各軍分路出師北伐。由李烈鈞率領滇、黔、贛各軍為第一路，兼攻贛南和鄂東；由許崇智率領本部粵軍為第二路，聯合湘軍直攻武漢。不過十天時間，北伐軍前鋒部隊已經分別進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孫中山與政府官員在非常大總統府舉行紀念辛亥革命十周年慶祝活動時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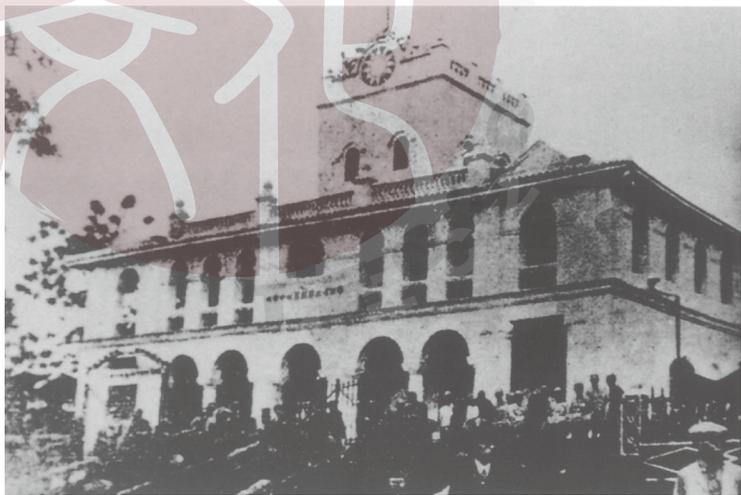
入湖南境內。

這時，北方政權已落在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的手裡，而由於軍閥間的利害矛盾，奉、皖兩系又形成了密約聯盟共同倒直的局面。在這種情勢下，孫中山便聯繫段祺瑞和張作霖，企圖藉助他們的力量配合討伐直系軍閥，「以戡亂之功，完護法之願」。

可是，留守廣東的陳炯明對孫中山的北伐命令，不但陽奉陰違，並和湖南督軍趙恒惕結成反對孫中山的聯盟，宣稱保境息民，避免戰亂，公開拒絕北伐假道，使入湘計畫受阻。孫中山被迫於四月八日回師廣東，改設大本營於韶關，準備改道北伐。

五月四日，孫中山在廣州下令北伐，表示將「親履行間，掃除政治上之黑暗與罪惡，俾國家統一，民治發達」。

五月六日，孫中山離開廣州親赴韶關督師。宋慶齡偕紅十字會員多人同行。八日，孫中山任命李烈鈞為北伐軍總司令，許崇智為總指揮，並發佈總攻擊令。紀律嚴明的北伐軍隨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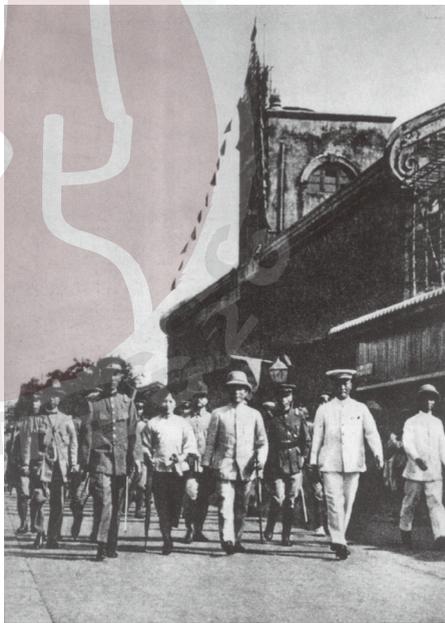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孫中山抵達桂林，在桂林獨秀峰下的桂王府建立北伐大本營。圖為北伐大本營舊址。

分為三路，一直向江西進擊，沿途秋毫無犯。江西是直系在華南統治力量最薄弱的省份，一經北伐軍進攻，即迅速潰敗。六月十三日，北伐軍攻佔了江西南部的重鎮贛州，直系軍閥陳光遠棄職逃竄。

接著，北伐軍乘破竹之勢，前鋒又進至吉安，威脅省會南昌，整個江西指日可以平定。此時，革命軍的聲勢大振，革命形勢非常好。

但是，歷史的進展常常不能盡如人意。也就在革命形勢大好之際，由於孫中山、陳炯明二人政見矛盾的日趨激化，加上處理上失於理智，雙方的火藥味越來越濃，終使矛盾升級，關係崩潰。陳炯明做出了「冒天下大不韙之舉」，在廣東內部竟發生了叛亂。

陳炯明雖然是個老革命黨人，也有些新思想、新作風，但他所依託的軍隊，其素質和其軍隊並無多少區別。他早在率領「援閩」粵軍回到廣州後，就成為廣東軍政大權的實際控制者。他一心一意要經營這塊地盤，大談「聯省自治」，宣傳「保境息民」，反對孫中山組織正式政府，反對選舉總統，認為孫中山的北伐是孤注一擲、盲目冒進之舉，更是強烈地予以



一九二二年五月，孫中山偕宋慶齡在韶關督師時的情景。

反對。他想方設法處處阻撓、破壞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千方百計地將孫中山架空。保存既得利益，是辛亥革命以後，許多國民黨人官僚化、軍閥化的基本原因。

一九二二年初，孫中山的北伐計畫屢受挫折。因為陳炯明反對北伐，也就是缺乏後勤的可靠保障，孫中山不得不督師回粵，下令罷免陳炯明的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等職，孫、陳矛盾進一步激化。之後，陳炯明更進而同英帝國主義和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勾結，從暗中反對革命發展到公開叛亂。

六月間，當孫中山從韶關前線回到廣州後，陳炯明於三月二十一日用卑鄙手段在廣九車站暗殺了堅決擁護孫中山的粵軍第一師師長鄧鏗；六月十四日，又以「領」和「有要事相商」為名，電邀廖仲愷去惠州；廖剛步入東莞縣石龍就被陳炯明逮捕扣押。接著其部屬葉舉、熊略召開軍事會議商討迫害孫中山的軍事部署，並於十六日清晨二十時突然發動武裝叛亂，以四千人圍攻總統府（在觀音山麓前，原為清新軍督練公所，今廣州中山紀念堂），並懸重賞二十萬元擒殺孫中山。他們先在全城密佈崗哨，斷絕交通，佔領各要害機關；然後將孫中山在觀音山住所粵秀樓團團圍住，準備用大炮、機關槍一起轟擊。

十六日凌晨一時，粵秀樓上已聽到遠處有集合號音；不久，連部隊的嘈雜聲都能聽到了。孫中山從臥室出來，命衛士準備防範。林樹巍、林直勉和陸志雲三人又急速跑來，力勸孫中山離開粵秀樓。孫中山說：「競存膽敢作亂，我便要負平亂之責。如力不足，惟有一死，以謝我四萬萬同胞。」林直勉等見事態危急，又知孫中山決不肯躲避，遂由幾個人用力強挽著

孫中山離開粵秀樓。馬湘和黃惠龍請求跟隨保衛。孫中山說：「你們不必跟隨，什麼危險我都不怕。你們要堅守粵秀樓。明天我若不回來，馬湘帶夫人到家中暫避。」說畢，孫中山就被林樹巍、林直勉、陸志雲擁著離開了粵秀樓。後來馬湘護衛宋慶齡到黃埔才知道孫中山脫險的經過是這樣的：孫中山離開粵秀樓後，他們穿過叛軍包圍，由小路到達德宣路，即見有許多陳炯明部隊向總統府進發。當走到惠愛路，正欲橫過馬路入桂香街時，被陳軍的哨兵攔阻，不准通過。林直勉指著孫中山對他們說：「我的母親患了重病，所以不得不深夜請來這位醫生到家裡診治。」但他們仍不許通過。林直勉又說：「我們住在高第街，你們如不信，就請一齊和我們到家裡看看。」哨兵看見孫中山穿了一件白夏布長衫，戴一副墨黑眼鏡，十足像個醫生，就讓他們通過了。及到靖海路，又遇陳部叛軍，孫中山態度非常從容鎮定，叛軍沒有懷疑，便又安然通過了。從此一直沿長堤走到海珠海軍總司令部，再乘小電船到了黃埔。隨即走到停泊在長堤天字碼頭附近的楚豫艦避難。他的許多著述手稿及同列寧通電、通信的寶貴的底稿，和其他來往函電，倉促中遭到毀棄。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廣東新軍閥陳炯明發動武裝叛亂，炮擊觀音山粵秀樓和孫中山大總統府。圖為陳炯明。

孫中山在軍艦上手擬電稿，號召各軍討平陳逆。稍後，移駐永翔艦。當天下午，衛士馬湘等護衛著宋慶齡冒著密集的彈雨炮火，也化裝逃出了總統府，並於十八日轉赴黃埔登上軍艦與孫中山會見。

第二天，孫中山轉登永豐艦（後改名為「中山」號），召集艦隊官兵，號召討伐叛逆，決定「由艦隊先發炮，攻擊在省叛軍，以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在」；然後「還駐黃埔，以俟北伐諸軍之旋師來援，水陸並進，以殲叛軍」。於是，他率領海軍各艦由黃埔向廣州進發，經車歪炮臺駛至白鵝潭，命令各艦發炮向大沙頭、沙河、觀音山等處射擊，叛軍紛紛逃竄。但因魏邦平所部旅長陳章甫受叛軍收買，未能遵照孫中山的命令策應海軍，以致失去時機，各艦隻好仍駛回黃埔。

六月二十九日，在寧波家中接到孫中山電報的蔣介石，到達廣州，登上永豐艦，與孫中山會面。孫、蔣兩人「談近日事及各方情況，至夜分乃已」。蔣介石隨即接受了孫中山交付的海上指揮權。正是通過此次與孫中山的共同戰鬥，蔣介石從此成為孫中山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在永豐艦上，孫中山一直隨艦移動於珠江上長達五十五天，盛暑鏖戰，精神體力消耗極大，然而臨危不懼，堅定勇敢，親自率領各艦和部分陸軍討伐叛逆，向陳炯明叛軍進擊。六月十九日，他還電令李烈鈞、許崇智等入贛的北伐部隊迅速班師回粵，鎮壓叛亂；並派副官馬湘赴香港，籌措糧食、燃料及軍費，準備堅持戰鬥到底。

陳炯明叛亂後，先是懸重賞捉拿孫中山；隨後，又多次密謀殺害孫中山。這些陰謀失敗

後，他在帝國主義和直系軍閥的指使下，還發出通電要孫中山下野。七月間，處於責難聲中的陳炯明一再委託負責廣州衛戍任務的魏邦平和嶺南大學校長鐘榮光等出來調解，要求「和解」，都被孫中山凜然拒之。孫中山立場堅定，嚴詞拒絕，始終不向叛軍妥協，他表示「寧為玉碎，不願瓦全」，堅持要鬥爭到底，討平叛亂。

陳炯明叛亂消息傳出後，激起了廣大人民群眾和海外正直人士的義憤，紛紛表示反對和聲討。海軍全體官兵發出通電，討伐陳炯明；廣州黃埔附近農民一千餘人組成義勇隊，協同海軍



陳炯明炮擊總統府時，孫中山在衛士和林樹巍、林直勉等掩護下，化裝脫險後初登楚豫艦，旋登永豐艦指揮平叛。圖為孫中山坐鎮指揮反擊陳炯明叛軍的永豐艦。

保衛黃埔；廣州電力、自來水和鐵路等行業工人舉行聯合罷工，要求叛軍撤出廣州；旅居美國、古巴和曼谷等地華僑先後發出通電，聲援孫中山討伐叛逆。陳炯明的叛逆行為非常不得人心。

但是，由於陳炯明得到帝國主義者的幫助，在軍事力量對比上占著優勢，他用魚雷大炮向孫中山的座艦猛烈攻擊；同時，又使用大量金錢收買海軍，結果海圻、海深、肇和三隻大型軍艦升火起錨，離黃埔港悄悄開走。北伐軍回師後，從七月十日至二十九日，與叛軍激戰於韶關和翁源一帶，因長期征戰，疲憊不堪，彈糧供給困難，在陳炯明和直系軍閥的前後夾攻下，遭受重大挫折，不得不分途向江西、湖南邊境退卻。

孫中山在反擊叛軍近兩個月後，聞知北伐軍回師援救受挫，孤軍無援，討陳已無法支撐，認為繼續留在海上於事無補，決定離粵赴滬。他於八月九日午後，懷著無可奈何的沉重心情，乘英艦「摩軒」號離開廣州，經香港再到上海。他領導的第二次護法運動又告失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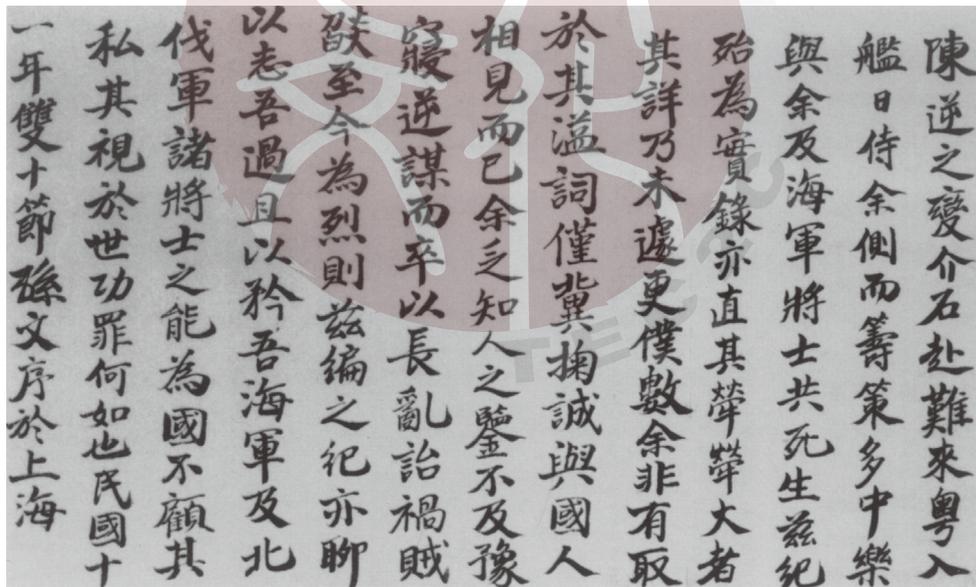
陳炯明叛亂，是孫中山一生中所遭受的最慘重的一次失敗。他過去歷次的失敗，畢竟是失



一九二二年六月，北伐各軍奉命回師討陳，但因兵員和武器供應等原因，各軍討陳戰鬥均告失利。圖為北伐軍第二軍司令許崇智。

敗於敵人；而這次失敗，完全想不到「禍患生於肘腋，干戈起於肺腑」，相從十餘年的部屬，竟要置他於死地，而且其手段陰險狠毒更勝於外部敵人。九月十八日，他在上海發表《就陳炯明兵變始末及未來計畫告國民黨同志書》中，詳盡地陳述了陳炯明叛亂的經過，將陳的罪行向全國說明。孫中山心情沉重地說：「我率領同志為民國而奮鬥，已三十年了。中間出死入生，失敗次數甚多。但失敗之慘酷，沒有大於這次的！」當時，他還認識不到軍閥產生的根源以及他遭受失敗的真正原因，以為只是「任用非人」所造成的。他自我檢討說：「我缺乏知人之明，沒有能及早察覺陳賊的叛逆，最後造成了大的禍害。」

孫中山為革命奮鬥三十多年，其結果卻如他自己所說的：「革命主義未行，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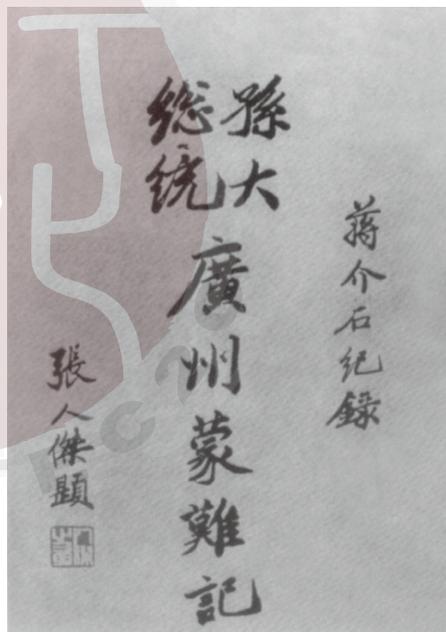
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
艦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樂
與余及海軍將士共死生茲紀
殆為實錄亦直其犖犖大者
其詳乃未遽更僕數余非有取
於其溢詞僅冀掬誠與國人
相見而已余乏知人之鑒不及豫
寢逆謀而卒以長亂詒禍賊
跋至今為烈則茲編之紀亦聊
以志吾過且以矜吾海軍及北
伐軍諸將士之能為國不顧其
私其視於世功罪何如也民國十
一年雙十節孫文序於上海

一九二二年十月，孫中山為《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一書所寫的序言。

命目的未達，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第一次護法運動，同北方軍閥決裂，也同南方軍閥分道；第二次護法運動，禍生肘腋，親手扶植的部屬變成新軍閥，從內部下毒手。兩次護法運動的結局——特別是後一次的慘敗，給了孫中山極大的教訓。

他痛定思痛，對過去的道路作更多的回顧和反省。孫中山覺悟到要實現救國救民的理想，只有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過去單純地利用一個軍閥去打倒另一個軍閥，是一條慘痛失敗的道路；老辦法應當徹底改變，必須尋求新的力量，走新的道路。

但是，應該怎麼辦呢？拯救中國的道路在哪裡？應該依靠什麼人？聯合什麼人，走什麼樣的新道路呢？孫中山需要找尋答案。



蔣介石撰寫的介紹陳炯明叛變及孫中山平叛經過的《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一書封面。